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史上的 结构和变革

〔美〕道格拉斯·C. 诺思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经济史上的 结构和变革

〔美〕道格拉斯·C. 诺思 著

厉以平 译



商务印书馆

2002年·北京

Douglass Ceil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Copyright ©1981 by Douglass Ceil North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nslation copyright ©1998 by Commercial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7年先后分七辑印行了名著三百种。现继续编印第八辑。到1998年底出版至34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8年3月

译者序言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于1981年出版，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近年来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诺思曾任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西方经济学会会长、华盛顿大学经济系主任，现任该校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诺思在学术上的贡献和影响主要有三方面：

(一) 他为1790—1860年美国经济发展设计出一种可称作“一国三方”的经济模式。他在1961年发表的《1790—1860年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观点。诺思认为，在1815年刚刚起步的美国经济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三部分独立的经济组成，即“北部”，从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州沿岸到宾夕法尼亚和北达拉华；“南部”，包括使用黑奴的各州；横贯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西部”。19世纪初，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逐渐将这三部分联成一片，但各地仍保留各自的相对经济优势。北部为南部和西部提供服装、鞋靴和工业制品；南部为北部提供棉花原料；西部为北部和南部提供粮食和农产品，为北部提供皮革。美国经济模式如同一个三足鼎，每个地区都依赖另外两个地区，三部分共同支撑着美国的经济。诺思运用现代经济学的资源禀赋理论、比较利益理论，被认为第一次圆满地解释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并且为从经济上解释日益加剧以至最终引发内战的地区矛盾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目前这个观点已成为大多数教科书所采用的标准体系。

(二) 诺思是六十年代支持创立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主要人物。他于1966年出版的《美国历史上的发展和福利：新经济史》使他成

为美国经济史新的研究方法的主要实践者。据另一位著名的新经济史学家休斯所说,“新经济史”一词就是诺思首创的。诺思和其他提倡这种研究方法的学者反对为叙述历史而叙述,建议经济史学家应用当代经济理论的观点和方法提出假设,验证和利用档案资料。他们主张任何假设都应当通过收集有关数量资料并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所进行的分析来严格检验。诺思在阐明和传播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起了主要作用。1960—1968年间他是这门新学科的领袖,1960—1966年他参与主编了《经济史杂志》,使这本最有声望的经济史刊物为自觉应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或计量经济学方法的文章敞开了方便之门。在这个时期,诺思发表的论文有《美国经济史的定量研究》(1963年)、《经济史现状》(1965年)和《经济史》(1968年)。他于1966年出版的《美国历史上的发展和福利:新经济史》向人们显示了新经济史的威力。在这本论文集中,诺思应用经济理论和表格的数量资料向当时流行的观点提出挑战,他证明可以利用最基本的经济理论对一些历史解释提出质疑。由于该书是第一本、在许多年内也是唯一的一本适用于大学本科的新经济史教材,因此,在一个时期该书一直拥有许多读者。至于他在该书中提出的一系列创见则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和热烈的争论,从而扩大了新经济史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对按照新方法培养出来的经济史学家的需求剧增,于是诺思所执教的华盛顿大学和格申克龙所执教的哈佛大学等机构成为新经济史学者的培训中心。在不长的时间里,一大批第二代新经济史学家脱颖而出,在全国大学经济系里担任了职务,并在这一学科里占据了支配地位。

(三) 诺思及其合作者设计出一个有关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的经济模式,从产权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其它组织结构的变革与创新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和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诺思在学术上的开拓进取是孜孜不倦的。他并不满意新经济史学依附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状况。1973年,诺思在就任经济史学会会长时所作的题为“超越新经济史”的演说中指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对于经济史学家来说有两大缺陷,一是它的目的不在于解释长期的经济变化,另一是即使它试图解释这个问题,它提供的答案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为了弥补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不足,诺思及其合作者努力创建适合于研究课题和特定时期具体情况的模式。1971年,他与戴维斯合作出版了《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1973年,他与罗伯特·托马斯合作出版了《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1981年诺思又单独出版了《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如果说前两部著作还属于个案分析,在理论上还没有系统的建树,实际考察也仅限于美国二百年的经济增长及西欧封建主义的兴衰和英、法、荷兰、西班牙四国的不同历程,那么,诺思在八十年代出版的《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则相当完整地提出了一套经济史理论,并且用这套理论考察和解释了自史前人类的经济生活至现代经济增长的漫长历史。诺思从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假定出发,运用交易成本、公共产品、相对价格等分析工具,构建了包括所有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新经济史学理论体系。诺思在本书中集中表述了这样一个中心思想:由于人类受其自身生产能力和生存环境的约束,只有通过交换即交易这一基本活动获得经济效益和安全保障,而所有权是交易的基本先决条件,所有权结构的效率引起经济增长、停滞或经济衰退。国家则规定着所有权的结构并最终对所有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此外,由于约束行为的衡量费用很高,如果没有思想信念约束个人最大限度追逐利益,会使经济组织的活力受到威胁。因此,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是一种节省时间精力的工具,有助于实现决策过程简化并使社会稳定和经济制度富有粘合力。诺

思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和人类社会的演进,显然是富有启示意义的。早在七十年代,当《西方世界的兴起》等著作出版后,在新经济史学研究领域便不断有追随者竞相仿效,运用类似的方法研究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过程,提出种种重新解释西方各国历史的观点。《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将新经济史学更加理论化和体系化,考察的时空跨度也更大。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赢得了更广泛的推崇和赞誉。我们将本书介绍给中国学术界,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展,广大读者会对此书的价值作出应有的评价。

目 录

序言	1
----------	---

第一编 理论

第一章 问题	5
第二章 经济结构导论	14
第三章 新古典派的国家理论	21
第四章 一个分析历史上经济组织的框架	34
第五章 意识形态和白搭车问题	46
第六章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60

第二编 历史

第七章 第一次经济革命	72
第八章 第一次经济革命的组织后果	89
第九章 古代社会的经济变革和衰落	111
第十章 封建制度的兴衰	122
第十一章 近代欧洲的结构和变革	141
第十二章 工业革命的反思	156
第十三章 第二次经济革命及其后果	168
第十四章 1789—1914年美国经济的结构和变革	183

第三编 理论和历史

第十五章 制度变革理论和西方世界经济史	195
参考书目	204

序 言

本书旨在为分析经济史提供一个新的框架。其所以需要新的框架,是因为经济史学家们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已不能解决经济史上那些主要的问题:即如何说明作为经济系统成就的基础的制度结构和获得这一成就的原因,以及如何说明此种结构的变革。制度变革理论的发展,是对社会科学家的一项重大挑战。本书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某些——当然不是全部——要素。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都把他们的模型建立在收益来自贸易的坚实基础之上。专业化和分工是《国富论》的关键。不过,经济学家在构建他们的模型时,对于这种专业化和分工所需要的成本一直忽略不计。这些交易成本支撑着决定政治—经济体制结构的那些制度。因而,本书的理论框架便与其它社会科学有一部分相重迭,并把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看作是解释制度变革的基本成份。相应地,本书的目的在于,使读者更为广泛而不仅限于经济史学家。心存此念,我力图尽量不用技术性的经济学语言。虽然在第一章我用正式的经济学术语提出了问题,但在本书的其它各章节,我都尽量使论点能够为非经济学者一目了然。

第一编的理论,提出把大部分经济史重新铸成新的模型;第二编,对西方经济史从农业起源到二十世纪这一万年作了适当处理。对经济史之所以要进行如此广泛的考察,理由在于,解释经济史上的进展,需要有一种概念基础。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并不比我们所用的理论更好,不幸得很,理论一直是有缺陷的。本书中的理论和据此而写成的历史论文,为系统考察和验证新假设提供一个基础,

这些新假设将引起对新证据的研究,而后对假设进行修改或反驳。

为了对知识有所贡献,理论就其潜意义应当是可驳的:既可直接根据研究所含的假定进行检验,也可间接根据逻辑引出的假定(从论据得出)加以检验。在不可能对经济史的解释作出最后验证的情况下,可以料想,不同部门所坚持利用的解释也是对立的,因而现今的政策法令才彼此冲突。不过,我提出一个现实的、而不是令人沮丧的忠告:如果我们相信对历史可以作出唯一科学的解释,那么我们不过是在欺骗自己;但如果我们不试图去达到那个目标,那么便是低估了经济史这门学科。持续研究可验证的假定和不断累积证据,可以使对立的解释数目减少。我们不可能在一切争论问题上都达成一致,但我们希望,在这些或那些问题上,我们能将可供选择的解释加以缩减。

本书是对与兰斯·戴维斯合作在《制度变革和美国经济成长》(1971年)和与罗伯特·托马斯合作在《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1973年)里开始的关于制度变革的研究的继续。我非常感谢在以前的研究中与我合作的这两位作者。此外,对于给予我目前这项研究以很大帮助的许多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其它学科的社会科学家,也至为感谢。我对四位背景不同的读者,抱有特殊的感激之情,是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整部手稿给予了详细的评论。他们是乔治·本特森、斯坦利·恩格尔曼、玛格丽特·利瓦伊和曼库尔·奥尔森。此外,我对交易成本和经济组织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我的同事史蒂文·切昂。

华盛顿大学的其它同事中,对我的部分研究提供了有益批评的,有约拉姆·巴泽尔、阿瑟·费里尔、迈克尔·赫克特尔、保罗·海涅、罗伯特·希格斯、莱维斯·科钦、卡罗尔·托马斯和迪安·沃斯特。

这部手稿的各部分曾在一些大学和几次会议上试用过,一些

章节曾征求过这些大学的同事的批评意见。给我提供了特别有益的批评的,有:摩西·阿布拉莫维茨、阿曼·阿尔切安、雷·巴塔利奥、理查德·比恩、卡尔·达尔曼、维克多·戈德堡、乔纳森·休斯、查尔斯·普洛特、加斯頓·里姆林格尔、汤姆·萨文、西奥多·舒尔茨、弗农·史密斯、戈登·塔洛克、伯顿·韦斯布罗德和奥利弗·威廉森。此外,我还要感谢在那些讨论会上帮助改进这项研究的许多同仁。

伊丽莎白·凯斯编辑了全部手稿。在这一过程中,她促使我去澄清我自己在每一页上的思想。

密执安州, 贝城

1980年8月

第 一 编

理 论

第一章 问题

我把经济史的任务理解成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所谓“绩效”，我指的是经济学家所关心的、有代表性的事物，如生产多少、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或生产的稳定性。在解释绩效时，最初强调的是总产量、人均产量和社会收入分配。所谓“结构”，我指的是被我们认为是基本上决定绩效的一个社会的那些特点。这里，我把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制度、技术、人口统计学和意识形态都包括在内。“整个时期”表示经济史应能解释结构和绩效的短暂变化。最后，“解释”是指明晰的推理和潜在的可驳性。

这项研究致力于经济史的两个主要的然而却被忽视的任务：一是将经济的结构理论化，另一是既说明这些结构的稳定性，又说明它们的变化。我将运用一个简单的新古典模型集中去考察绩效的总产量和人均产量方面。不过，为了解释收入分配和一个经济的结构，我们还必须把理论延伸到传统的新古典领域以外。

我们先来描述一下新古典派用以分析经济绩效的方法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这一方法假定面临普遍匮乏，个人作出的选择反映了一组欲望、需要或偏好。这些选择是根据放弃的机会做出的。因而多工作一小时的机会成本(和所得到的增加的收入)等于放弃的

闲暇。这一效用,即福利最大化,要求假定个人对收入、闲暇等有一组固定的偏好,因而边际选择(即当个人决定多工作一小时时所作的选择)是指在得到(更多收入)还是应当放弃(闲暇)之间所作的权衡。^①这一行为假定在各种经济制度(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起作用。

既然最大化假定宣称个人宁可选择较多的而不是较少的商品(和劳务),既然提高生产潜力(要牺牲为现期消费而进行的生产)可以生产较多的商品,因而整个社会,人人都将为增加资本存量贡献他们的部分成果——因为资本存量的大小决定着构成一种系统产生的商品和劳务的流量。资本存量的规模由人力资本(劳动)、实物资本(机器、工厂、农业改良等)和自然资源的数量构成。这些又取决于可以利用的技术(即人对自然的支配),换言之,可用的技术决定着劳动体现的技艺(人力资本)、实物资本的质量和自然资源的构成。技术变革被认为是内生的,并被看作是社会成员投资于发明和创新的结果。不过,“发明的潜力”又取决于知识的存量(对自然环境的认识)。

因而,决定产量的资本存量是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技术和知识的函数。最大化假定将导致对具有最高收益率的那部分资本存量进行投资,那部分存量相对于其它存量在数量上将会增长,从而保证使收益率逐渐拉平。而后,新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将会创造出来,而新的自然资源则会被发现,此时,将放弃的消费(即储蓄)投资于发明或发现那些特别的技术和自然资源而得到的收益率超过了现有各种机器和技艺的扩张而得到的收益率。如果劳动力规模相对于资本存量增长,那么,调整人力和实物资本的

^① 参见贝克尔的导言(1976年)对新古典派假定的一个传统论述。弗洛伊德(1969年)关于新古典派方法运用于经济成长的出色阐述使我受益匪浅。

形式以适应资本劳动力比率的变动,将是有利可图的。同样,也可以对自然资源存量进行某些调节。

在这些情况下,总产量的增长和人均产量的增长,是由已储蓄的(和已投资的)收入部分和人口增长率所决定的。如果已储蓄的收入部分导致的产量增长正好等于人口的增长,那么,人均收入增长为零。另一方面,如果储蓄率高于人口增长,那么,将导致实际人均收入率增长。

从经济史学家的观点看,新古典派的这一公式似乎是用未证实的假定来解释一切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它所涉及的社会是一个无摩擦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制度不存在,一切变化都通过完善运转的市场发生。总之,获得信息的成本、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都不存在。但是,恰恰因为这种不存在,新古典派公式才提出那些有待探讨的基本假定,以便发展一种关于结构和变革的有用理论。

首先,模型假定一种刺激结构将使个人按全部差额得到投资的社会收益,就是说,使个人和社会的收益相等。其次,它假定,新知识的获得和利用的收益不递减,因为在成本固定下能够增加自然资源的存量。第三,它假定,储蓄有实际收益。第四,假定生育后代的个人和社会费用是相等的。最后,人们的选择和预期的结果是一致的。让我们对每一点依次进行考察。

规定完善和无需成本实施的所有权(即零交易成本)是坚持第一个假定所必需的。这样的条件从来没有具备过。而当今象整个历史一样,许多资源更接近于公有财产而不是专有财产。因此,达到同等边际效率解决所必需的条件,无论是罗马共和国,还是二十世纪的美国或苏联,从来就不曾有过。在已经历过的那些社会中,最好的不过是把个人收益提高到与社会收益相当接近的程度,以便提供足够的刺激来达到经济增长。然而,增长与停滞或衰退相比要少见得多。这一事实表明,“有效率的”所有权在历史上并不常

见。特别是个人向来不具备从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加中获得社会收益的能力,或者说,这种能力很不完善。因此,不仅技术进步在整个历史的大部分阶段是缓慢的,而且,自然资源存量的收益递减也是人类最重要的经济难题。

那个难题使我们得出模型的第二个假定:科学和技术仅仅在现代才合而为一,真正克服了收益递减。虽然西方国家在上个世纪不曾经历过自然资源收益递减,但它们必定在更久远的往昔经历过。

储蓄的实际收益的存在,也取决于所有权结构。在整个历史上,已储蓄的收入的比例和资本构成的比率(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通常是极低的,有时为零或负数。对所有权的担保是储蓄和资本构成比率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

生育后代的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一致,不仅意味着人口出生率受人的控制,而且意味已有的刺激和抑制结构随时调整个人的生育决策,以适应于人口增加所需社会成本的变化。马尔萨斯危机在整个历史上反复出现就充分证明这一条件尚未具备。

最后,我们要提一下最后一个假定:选择与结果的一致。新古典理论与经济史的基本含义有关的一个颇有影响的见解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人利润即福利的最大化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没有人能肯定一项决策的后果),不过,福利最大化的结果仍然存在。它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普遍不足的情况下,竞争决定着比较有效率的制度、政策或个人行为会存在,而无效率的制度、政策或个人行为则归于消灭。^①这一见解是理解经济组织的制度形式演变

^① 参见A.阿尔切安(1950年)关于这一论点的经典论述。这整个研究所用的“有效率”和“无效率”术语,都是为了比较两组约束的含义——在一组里,参加者的最大化行为带来产量增长;而在另一组里,则不带来产量增长。